

唯物史观和人道主义异化问题

叶汝贤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唯物史观和人道主义、异化问题

叶汝贤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唯物史观和人道主义异化问题

叶汝贤 著

*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省南海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7.5 字数160千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书号：2339·3 定价：1.50元

目 录

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试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马克思主义

哲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1)

《德意志意识形态》制定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16)

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人的哲学”…… (38)

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不是“人”，而是“人的

劳动”…… (55)

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 (70)

我们主张革命的人道主义…… (87)

关于人道主义的几个问题

——学习札记…… (92)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形成和演变…… (116)

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 (116)

二、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人道主义…… (118)

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人道主义…… (121)

四、实证主义的人道主义…… (123)

五、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 (125)

“社会主义异化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128)

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是“自主劳动”

——兼评“社会主义异化劳动论” (144)

异化概念的历史演变以及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理解

和运用 (152)

一、异化概念的历史考察 (152)

二、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理解和运用 ... (175)

三、当代学者对异化概念的滥用 (226)

后记 (235)

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试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哲学上的伟大的革命变革。这一革命是何时实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哪些著作可以作为实现这一革命的标志？这些问题，是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的一个关键，又是关系到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特点的重大问题，弄清楚是十分必要的。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标志。一般地说《共产党宣言》标志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可以的。但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也以《共产党宣言》为标志，那就不确切了。这一著作虽然深刻体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行动纲领，它直接论证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它主要是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而学术界许多人（包括主张《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标志的人）又认为，《哲

学的贫困》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这就令人费解：为什么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标志，而要用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作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没有这一理论基础的确立，决不会有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应该说，早在《共产党宣言》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产生，《共产党宣言》只不过是贯彻这一新世界观的最光辉的文献罢了。

另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年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已经标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因为列宁说过，这些著作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完成了向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转变。而恩格斯在说明他和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时，也指出，当他还在曼彻斯特的时候，就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而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而且在《德法年鉴》上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①。这说明，早在1844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发现了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的基本思想。有的同志就由此得出结论，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诞生了。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前的看法极其有害，会使人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任意拔高，进行“现代化”的解释，从而导致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页：

毫无疑问，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表明他已实现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但是，对一个正在成长过程中的思想家来说，世界观的转变同独立地创立一门崭新的科学，是有重大区别的。我们说《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主要是从下面两种情况作出的判断：第一，这一时期，马克思开始了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这表明他已经站在唯物主义的基地上；第二，马克思当时对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的分析，已经是以唯物主义为理论出发点。“不破不立”，但“破”并不等于“立”。马克思当时主要还是处于“破”的阶段，即主要处于同旧哲学、特别是同思辨唯心主义决裂的阶段。他虽然在批判唯心主义和研究具体现实问题中表现了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但他还没有从哲学理论形态上阐明这种观点，还没有创立自己的与一切旧哲学根本不同的哲学。因此，把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等同起来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也应该看到马克思当时并不仅仅是“破”，他在批判唯心主义的过程中已表达了一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的基本思想，但也不能由此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诞生的结论。应该区别一个观点的提出和这一观点的成熟，区分个别的孤立的观点的阐述和哲学体系的形成。马克思当时在批判思辨哲学中表述了一系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思想，如“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世俗桎梏”产生“宗教桎梏”等等。但是，这些思想还是笼统的，而且往往采用旧哲学的概念、术语加以表述。如“市民社会”就是旧哲学的术语。马克思当时采用这一术

语，只是笼统地把它理解为物质利益领域，还不了解这一领域中究竟什么东西构成决定国家的基础。后来马克思发现了“生产关系”的作用，就用“生产关系”这一科学概念代替了它。可见，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表达的一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还不是成熟的思想。而且，不管这些思想多么重要，在当时也只是一些个别的孤立的观点，它们还没有构成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的整体。怎么能够以这种用不科学的概念所表述的不成熟的思想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标志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的伟大革命。它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不仅同一切唯心主义哲学根本对立，而且同一切旧唯物主义根本对立。因此，作为这一新世界观产生的标志，必须具有在质上与一切旧哲学根本不同的鲜明特点。可是，我们从《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发表的论著还看不到这样的鲜明特点。马克思1843年离开《莱茵报》后，就开始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进行批判，此后，他继续把自己的观点同唯心主义鲜明对立起来。但是，直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他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都主要是批判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并没有批判旧的唯物主义，特别是还没有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相反，在一些地方，还对后者作了不适当的过高的评价。例如，1844年8月11日，即马克思正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他在给费尔巴哈的一封信中写道：“您的两部著作《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在这些著作中，

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①实际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仅仅给社会主义一个派别，即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它同科学社会主义是对立的。直到《神圣家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仍给予热烈的赞扬。这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理论观点还不成熟，还没有同旧唯物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线。他们当时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进行批判，主要还是以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出发点。由于他们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把理论批判同现实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因而这些批判的结果导致他们得出一系列的重要发现，走上了一条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具有本质区别的道路。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说明，这个时期马克思还处在形成自己的思想观点的过程中，他的思想观点仍然具有过渡性的特点。我们在分析马克思这个时期的著作时，只有估计到这种特点，才不会作出歪曲的解释，才可能正确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场合曾经阐述过他们的思想的形成过程。这些阐述应该是我们考察这一问题的指导思想。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作了最为详尽的科学的阐述。他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下称《提纲》）作为本书的附录公开发表，就有其深刻的用意。他指出，《提纲》“作为包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等450页。

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①。显然，在恩格斯看来，正是这一《提纲》标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的过渡阶段的结束和新质阶段的开始，标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

马克思写作《提纲》，不是准备发表，而是作为进一步研究用的。那时，即1845年初，由于德国反动政府的请求，法国政府下令驱逐马克思。旧世界驱逐马克思，是由于马克思驱逐了旧世界的世界观。这时候，马克思已经“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②，并同恩格斯一起，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可见，这时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产生了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跃进，而记录这一跃进的第一个文件，就是《提纲》。马克思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制定了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具有全局意义的范畴——社会实践。这就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第一次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社会实践这一基本范畴作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有机统一的整体、一块“整钢”。恩格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把《提纲》当作“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标志。

《提纲》一开始，马克思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他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8—209页。

②同上书，第192页。

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①旧唯物主义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时，主张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但是，由于他们看不到社会实践的作用，他们不论对物质、客体，还是对意识、主体的看法都是直观的、形而上学的，因此，他们不能理解物质和意识、客体和主体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他们把客观事物、社会现实仅仅看作是一种静态的客观存在，仅仅是人的认识对象，而不是改造的对象；另一方面，他们又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仅仅看作是消极被动的感受主体，看成“一面镜子”。因此，他们只看到客观世界作用于人的感官，看到“物质决定意识”，而看不到人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看不到意识的能动性，因而他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虽然是唯物主义的，但却是片面的。忽视实践的作用，正是旧唯物主义不能彻底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并给唯心主义留下漏洞的基本原因。

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中，提出并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这就使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获得了全新的性质。

首先，由于实践范畴的创立，马克思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贯彻了既唯物又辩证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中间，存在着实践和认识的关系。物质是第一性的、本原的，实践和意识都是物质所派生的。人的实践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实践有其主观的方面。但人的活动本身、实践本身又是

^①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下引马克思的话，不另注明出处的，均引自这一文件。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客观的，它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因此，实践总是主体和客体的辩证的统一。实践和意识虽然都是由物质所派生，但两者并不是同一水平的范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人的实践活动却可以对它进行改造，实践的过程和结果表明了物质的第一性。马克思认为，对事物、现实、感性，即对自然、社会和人本身，要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就说明作为人的认识对象的事物、现实、感性，是同人的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人的认识对象正是人的实践的产物。客观世界是人的认识对象，也是人的改造对象，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正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实践高于认识，因为它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而一定的认识一经产生，又会回过头来服务于实践，成为实践的主观因素，成为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的因素。这样，由于实践范畴的创立，就不但科学地阐明了物质怎样决定意识，而且科学地阐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社会实践不仅证实物质是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且证实这一客观存在的可知性。由于作为人的有目的的感性活动的实践具有客观性、物质性的特点，由于它能够以集中的形式再现客观世界的有规律的过程，因而它能够成为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能够证明人们认识的真理性的。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一般来说，旧唯物主义肯定

人能够正确地认识世界，肯定客观真理。但是，由于他们看不到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因而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同样是不彻底的。有的唯物主义者把理论上是否明晰清楚、是否能够自圆其说当作真理的标准，这是离开实践企图在思维的范围内证明思维的真理性的，这纯粹是一种经院哲学的方法。费尔巴哈以“直观”作标准，实质上是以人的感性知觉、以人的主观感觉为标准，这是在真理标准问题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导致主观主义的典型例子。费尔巴哈有时也提到“实践”标准，提出过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但他并不懂得实践的本质，因而也不懂得他自己所提出的命题的意义。他有时把实践归结为理论活动，有时又主要从犹太人利己主义活动形式去理解。因此，如果说费尔巴哈也提出过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的的话，那只是一种思想的闪光，对他整个哲学的性质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费尔巴哈虽然坚持唯物主义的可知论，但并没有真正解决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问题。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才彻底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早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把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理解为实践。现在，他又进一步把实践理解为“改变世界”，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就揭示了实践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形式。马克思强调，只有实践才能证实在我们的思维中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证实思维反映存在的正确性。所以，实践的结果实现和证明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有力地驳斥了不可知论，同时也同机械唯物论划清了界限。这样，通过引入社会实践这一基本范畴，马克思就唯物地辩证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

其次，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实践不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而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通过实践，产生了作为社会的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同时产生了人和人的关系，产生了社会。费尔巴哈由于不了解社会实践的作用，只看到人的自然性，看不到人的社会属性；只能把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自然情感的关系，而看不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因而他的唯物主义只能停留在人本主义上，无法达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根本不同，马克思由于发现了社会实践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认识中的决定性作用，因而找到了一条由辩证唯物主义过渡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桥梁，找到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组成部分有机地统一起来的杠杆。

马克思从总的方面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一般局限性以后，就转而集中批判它的唯心史观。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但是，怎样理解环境？环境是怎样改变的？教育者的知识和才能又从何而来？旧唯物主义者由于看不到社会实践的作用，他们无法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只能从直观的意义上理解环境，把它看作是一种纯粹的自然客体，看成一种感性的存在。而当进一步论及环境变化的动因时，他们又从历史发展的表面现象出发，认为天才人物的意见支配世界。一方面认为“环境决定思想”，另一方面又认为“意见支配世界”，弄不清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马克思指出：“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要把“环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人们所处的一定的环境，总

是由人们的实践活动所造成的社会的环境，应理解为一种社会的存在。因此，一定的社会环境的造成，在它成为改变人的原因之前，首先它是人们实践活动的结果，而教育者的知识和才能，也不是天生的，同样是从实践中来的。所以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在实践中改变了环境，改变了人们生活的社会条件，同时也就改变了人本身；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都是以革命的实践为基础的。

马克思从同样的基本观点出发，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他指出，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根据唯物主义的原则，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哪。”这主要的事情就是他没有从社会实践出发，不是进一步去分析“世俗基础”、社会存在本身，而在半路上止步了。费尔巴哈认为，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宗教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但是，他用人本主义来说明人的本质，认为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人的本质，人的活动就是使这个人的“本质”感到满足的东西，即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行使自己的天然职能，使自己感到幸福。费尔巴哈完全是用人的自然属性来说明人的本质。因此，他只能看到一种抽象的人类个体，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把许多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因此，当他把宗教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时，他是用人的自然属性去说明宗教。而在他看来，要消灭宗教，关键的是通过教育，使人从迷信中解脱出来，克服人的

本质的异化，使人过符合其族类本质的生活，即用“爱”的宗教来代替神学的宗教。可见，由于看不到社会实践的作用，费尔巴哈无法正确地阐明宗教的本质，也无法找到克服宗教的途径。

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中深刻地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及其社会根源。他指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马克思肯定费尔巴哈用世俗基础去说明宗教的唯物主义观点，但马克思比费尔巴哈前进一步，他并没有在半路上停下来，而是进一步分析世俗基础本身，从而阐明了在这个世俗基础之上为什么会产生宗教世界观。在马克思看来，世俗的现实的内容，采取神秘的表现形式，就是因为世俗基础、现实本身的分裂和矛盾。早在1843年秋天，马克思就在《论犹太人问题》一书中指出：“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桎梏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桎梏。我们并不认为：公民要消灭他们的世俗桎梏，必须首先克服他们的宗教狭隘性。我们认为：他们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①从这里可以看到费尔巴哈的影响，也可以看到马克思已超越过费尔巴哈。他要用“世俗桎梏”、“历史”来说明宗教，而不像费尔巴哈用纯粹自然的原因说明宗教。现在，由于揭示了社会实践的作用，马克思又进一步揭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5页。